

庄洋

姤紫嫣紅開遍，盡付與斷井頽垣
——淺談白先勇筆下“臺北人”的心態

引言：白先勇先生是出生將門的文豪，他的一生與大陸、臺灣、美國的交集甚多。如他自己所言，“我的童年是在大陸度過的，但我的作品卻都在海外、臺灣、美國完成”²。隨著國民黨“中原一敗勢難回”（宋·王安石《疊題烏江亭》），包括白先勇在內的不少大陸人離陸赴臺，成為了“臺北人”。

“故都”南京的莊嚴肅穆，上海灘的華燈初上，這些都成為“臺北人”遷臺後的美好回憶。他們中有的人還能維持表面的多姿多彩，可他們的心態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

縱觀整部《臺北人》，有關“上海印象”的篇幅不可謂不多。民國時期的上海被喻為“東方的巴黎”，有著無限的活力與衝動。十里洋場之不眠夜，百樂門之鶯歌燕舞，正如《夜上海》的歌詞“酒不醉人人自醉”。然而，遷臺之後的“臺北人”卻被眼前的破敗與冷寂打破了幻想。心中的羈絆不只是遠隔海峽的親情，更是對過去榮華富貴之生活的難以割捨。

尹公館、夜巴黎，這些充滿上海情調的臺北“百樂門”成為了新的世外桃源。“總也不老”的尹雪艷（《永遠的尹雪艷》）和“玉觀音”金兆麗，這兩位在百樂門叱吒風雲的頭牌，到了臺北後風采依舊。賓客們趨之若鶩，奏起了最後一支《夜來香》。

對於尹雪艷的印象，總離不開一抹白色，如“蟬翼紗的素白旗袍”（P4）、“冰雪化成的精靈”（P5）、“通身銀白的女祭司”³（P10）。描寫金兆麗時，白先勇卻採用以金色為主色調的描寫：“黑紗金絲相間的緊身旗袍……金碧輝煌地掛滿了一身”⁴（P51）。傳統印象中，白色總是不喜慶的，因而尹雪艷落了個“八字帶著重煞，犯了白虎”（P4）的評價。金色則與奢華掛鉤，隱隱地透出些銅臭味來。尹、金二人或許能用手段迷住男人和女人，卻迷不倒時代。臺北終究不是上海，眼前種種也終將成為虛無。若把尹公館看作艷都城，那尹雪艷則是勾魂索命的白無常。那些踏進尹公館的客人們，從認識尹雪艷那刻起，他們的魂魄已然被收了，只是還沒到時辰拿走他們的肉體罷了。尹雪艷的乾爹吳經理，“患著嚴重的風濕，走起路來，十分蹣跚，眼睛又害沙眼……眼圈已經開始潰爛”²（P7）。拖著老病之軀的他依舊是座上賓，麻將桌上總少不了他的身影。吳經理的外甥徐壯圖，也在認識了尹雪艷不久後便意外身亡。

拋開迷信角度，他們的遭遇並非是惹了煞氣，乃是一種醉生夢死的人生態度。

飽受病痛折磨的吳經理，仍希望在麻將桌上多贏幾局，求個“否極泰來”的盼頭。即便如此，尹雪艷還要來“吃你的紅”。至於徐壯圖的離世，更像是對社會的一種警告。日漸墮落的心態，會殺人於無形。離陸赴臺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讓無數“臺北人”適應不了角色的轉換。或沉醉于“尹公館”這樣的夢境重現，或像金兆麗一樣變得滿身銅臭，用對金錢的欲望填補心中的空白。

鮑國華在評價《臺北人》中的上海印象時，認為白先勇“以濃墨重彩描繪上海的物質世界，卻並未表達對現代都市文明的讚賞與迷戀”⁵。王澤正進一步指出白先勇文中的悲憫之情，“命運的年輪運轉不息，我們作為人的個體，只能是順從，這就是生命的無常和命運的殘酷性的展示。”⁶

二、

兩場白事、一頓飯局，送走的並非是舊人，而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許多人的希望隨著《歲除》的爆竹聲化為了“一蓬銀光”劃破天際，隨即消亡。“南望王師又一年”（南宋·陸遊《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二首》），望的豈止是可以北定中原的王師？更是希望“望”見為了堅守理想而執殳前驅的一潮潮後浪。

《歲除》中的賴鳴升參加過北伐、抗戰，口中比青天白日勳章還要稀罕的是“胸膛右邊赫然印著一個碗口大，殷紅發亮的圓疤”⁷（P45）。面對後輩的誇誇其談，賴氏甚為不屑，“憑了這個玩意兒（即胸膛上的圓疤），我就有資格和你講‘臺兒莊’，沒有這個東西的人，也想混說嗎？”⁶（P45）他是個粗人，不懂得詭譎心機，也不懂政治，表面的粗糙掩蓋不了一片赤子之心。“糞土當年萬戶侯”（毛澤東《沁園春·長沙》）用在賴鳴升身上再合適不過，在他的眼中，軍人背負著民族危亡，義無反顧地血戰沙場是再光榮不過的事。但把別人的犧牲作為談資，這是不能容忍的對烈士的侮辱。白先勇親眼目睹了“臺北人”遷臺後心態的巨大變化，這些“臺北人”已經漸漸失去了當年為了民族革命而殺身成仁的血氣方剛，留下的是沉浸於對別人的崢嶸歲月的誇誇其談。

《國葬》中，老邁的秦義方以“副官”身份來送李浩然將軍最後一程，除了曾經同在麾下聽令的章健、葉輝、劉行奇，再也無人對他們問津。“這些新升起來的將官們，他一位都不認識了”⁸（P184）。無獨有偶，從摯友王孟養的葬禮上回來的樸公也頗感不懌，王孟養之子王家驥可算是他的世侄，在禮儀上“竟不大懂事。大概在外國住久了，我們中國人的人情禮俗，他不甚瞭解。”⁹（P93）。白先勇在此可能是借樸公之口，批評後代們行事“缺少歷練”。樸公與仲公、王孟養同為辛亥革命的勳臣，親眼見證了英雄從崛起、如日中天到沒落，兩位結義兄弟先後撒手人寰，樸公已生出了“關張無命欲如何”（唐·李商隱《籌筆驛》）的悲戚之感。

《梁父吟》是山東民謠，收錄於漢朝的樂府詩中。諸葛亮躬耕南陽時最喜此

歌。王孟養在辛亥革命成功後揮刀大呼的形象又使人聯想到張飛橫矛喝斷長阪橋的故事。因此，在分析以《梁父吟》為題之原因時，歐陽子提出了兩種解釋——王孟養的“狂狷”形象對應的是蜀漢“虎臣”張飛，以“梁父吟”為題則是影射諸葛亮。由此，歐陽子大膽提出“在描寫樸公時，確實特別賦予他中國古代理想政治領袖的風度與氣度，以及純粹漢族之正統古典精神”¹⁰。歐陽先生與白先生是同學兼好友，她對於《臺北人》中的心理剖析之準確基於她對白先生的瞭解。無論王孟養這一形象究竟偏向哪個人物，白先生對樸公兄弟三人的悲憫與同情溢於言表。

結合莊嚴肅穆的《國葬》、以熱鬧偽裝冷寂的《歲除》，這些時代的英雄們“生前赫赫，死極哀榮”，賴鳴升念念不忘“打回四川”，王孟養病歿前要求“無論如何要把他的靈柩移回家鄉去”⁸ (P97)。這裡的描寫不能被誤讀，白先勇並非是在宣揚“反攻”戰爭，而是借王孟養之口引出中國人的歸葬文化。王宗法對此的評價認為是一種值的悲憫的“文化鄉愁”，“此情此心正是鄉愁至死不泯的深刻寫照”¹¹。白先勇的筆法深刻多以敘寫小人物為主，他們經歷過的時代真真切切，他們左右不了局勢。大勢所趨之下，仍堅守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節，這些正是華夏文化的精髓。

三、

在進一步分析白先生筆下的人物時，我們需要回歸一個原始問題，即如何定義“臺北人”。表面的意思即指那些原本生活在大陸，跟隨國民黨敗退臺灣的人，其中不乏軍人及其眷屬、舞女、僕役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王宗法對此的解釋更深一層，他認為白先勇筆下的臺北人“客觀上都是一群放逐者……本意是暫住……總之沒有一個樂不思蜀、甘老斯鄉，倒是人人午夜夢迴，鄉愁難遣。”¹⁰ 在進一步闡述該觀點時，王先生給出了兩個切入點：白先勇此時的心境以及臺灣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轉型，把老弱的軍人“拋出生活軌道”。

筆者認為，《臺北人》的心態大抵是三種：對文化傳承之輕視、對過去之不能自拔繼而引發的兩種變化：意志消沉、渾渾噩噩，或是以紙醉金迷來麻痹神經，飲鴆止渴。戰爭會成為過往，民族內部矛盾會漸漸消除，但文化的傳承卻不能中斷。上一代人奮不顧身只為追求理想，至死不渝的精神還能否被下一代所接受？《梁父吟》中，樸公對小孫子效先的面嚴心慈，把他從一個“小洋人”變成“背得上幾首唐詩”的中國人；可樸公年已七旬，體貌日衰。在他身後，效先極有可能被父母帶回美國，重新成為一個“小洋人”。結合彼時的冷戰背景，我們不難理解這一現象在臺灣社會的存在。如論及白先勇對這一現象的態度，“憤怒”、“欣喜”這類的形容詞或有失偏頗，遺憾和隱憂於心更準確些。文化本無高低之分，也難以做到長期地一枝獨秀，正如葛劍雄教授所言，“總體上先進的文明、文化，都

是不斷自覺地吸取其他文明的精華、學習其他文化的長處的結果”¹²，並由此定論：中國文化不斷更新，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白先勇對文化的態度應相類似，“對急於丟棄傳統文化而去崇尚西方文化一代年輕人的擔憂和不信任感。”¹³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于君王卷土來？”（宋·王安石《烏江亭》）最可怕的兵敗並非是損兵折將，而是士氣再難凝聚。賴鳴升誇讚劉營長之子劉英“將來恐怕還是個將才呢”，劉太太卻冷嘲道，“這個世界能保住不餓就算本事，我才不稀罕他做官。”⁶（P39）賴鳴升看重的正是劉英敢直言想當陸軍總司令的少年膽氣，樂於見到後輩們像他那樣熱血。劉太太想得卻是讓後輩能做到“不餓”。此時的劉營長夫婦已斷然沒有“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理想，不管是高官還是平民，如今不都擠到這小小的臺北來了嗎？儘管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初心是什麼，但從賴鳴升的表現來看，他們當年也應該是豪氣沖天的義士。如果長期的家庭教育都是如此，長大後的劉英只怕連超越其父的成就都不能了。可有類似遭遇的孩子，在臺北人的家庭中只怕不在少數。

白先勇先生也是眾多“臺北人”中的一個，可他身為局中人尚能如此尖銳地指出問題及其癥結，實在難得。白先生一生致力於傳承和發揚華夏文化，這是基於他發自內心的文化自信與責任感，其散發出的生命力超脫世俗之爭。王澤正先生在評價《臺北人》的魅力所在時，歸因於“白先勇的文學底蘊，自身的悲劇感和匠心獨運的章節展示”⁵。歐陽子亦評價“唯有文學藝術，是不受時空限制，融匯‘今’、‘昔’的。”¹⁴在白先生看來，文化意識也許才是給臺北人最好的醒酒湯。他在開篇引用唐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劉禹錫《烏衣巷》），“舊時王、謝”大致是喻指貴族的凋零。就歷史發展來看，“貴族”作為一種象徵特權階級的社會身份，退出歷史舞臺是必然的，但是那種為了理想而堅守的“貴族精神”卻未必需要退出。“臺北人”不能也不會永遠沉淪，如果有朝一日他們重新拾起了那種曾經讓先輩引以為豪的文化認同感和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貴族精神”，“臺北人”終將再次容光煥發。

參考文獻：

1“姍紫嫣紅開遍，盡付與斷井頽垣”一句，援引自明朝湯顯祖的《牡丹亭·皂羅袍》，原句為“原來姍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2 白先勇：《自序》，《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東：花城出版社，第1頁，2000。以後對原文的引用皆出自此版本。

3 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東：花城出版社

4 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東：花城出版社

- 5 鮑國華：《論〈臺北人〉中的上海形象》，《華文文學》，2003年6月總第59期
- 6 王澤正：《淺析白先勇臺北人》的悲涼意味》，《中國文藝家》，2019年10期
- 7 白先勇：《歲除》，《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東：花城出版社
- 8 白先勇：《國葬》，《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東：花城出版社
- 9 白先勇：《梁父吟》，《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東：花城出版社
- 10 歐陽子：《〈梁父吟〉影射含義的兩種解釋》，《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東：花城出版社
- 11 王宗法：《論白先勇的文化鄉愁》，《臺灣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
- 12 葛劍雄：《中華文化自信的根由》，《北京日報》，2019年10月14日第015版
- 13 孫楠：《從〈臺北人〉看白先勇的文化意識》，《青年文學家》，2019年第5期
- 14 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廣東：花城出版社